汉代的西方经略和两关设置年代考

□日比野丈夫 著，王　蕾 译

摘要：本文对汉代玉门关、阳关的设立时间与位置进行讨论，对比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敦煌出土汉简和文书及传世史料相关记载，认为玉门关设立于元鼎末年（前111）至元封年间三、四年（前108、107）间，玉门关的位置从设立之初就一直没有发生变化。通过修订前说，重新考证敦煌郡的开设时间为太始、征和交际（前93、92）之时，而阳关的设置应在敦煌郡成立前后。同玉门关相比，西汉时期阳关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逐渐发展，一度成为西域交通的主要起点，直至汉末荒废。

关键词：玉门关；阳关；敦煌郡；汉简；敦煌文书

作者简介：日比野丈夫（1914—2007），男，日本京都市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东洋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译者简介：王　蕾（1988—），女，黑龙江同江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河西历史地理研究。

众所周知，汉武帝为确保对今天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统治，在西端设置了玉门、阳关二关，使其成为通往西域的门户。从此中原和西域之间的往来，都要经过这两个关。但为什么要在西出敦煌后在距离如此相近的两个地方，分别设置两个职能相同的关呢?玉门关通往西域北道、阳关通达西域南道的说法在唐代才开始出现，绝不是汉代就有这样的区分。另外，关于两关的设置年代问题，对玉门关的记载还可以看到一些，但关于阳关的记载却很少，这是不可思议的，应与敦煌郡的设置存在密切联系。本文的目的就是考察位于河西四郡最西端的敦煌郡的设置时间，玉门关和阳关的开设年代及其相互关系。

一

关于汉代玉门关的位置，最初产生疑问的是法国学者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序[1]中叙述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太初二年（前103）李广利第一次征伐大宛班师时的情况“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①据此认为当时玉门关位于敦煌之

东。同书《大宛列传》元封三年（前108）②记载"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③玉门就是玉门关，在当地出土了太始三年（前94）的纪年木简④："太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署就"。这枚木简是斯坦因在敦煌西北100公里，东经94°稍偏西的T. xiv遗迹发现的，可知在太初三至四年（前102—101）第二次征伐大宛之后，长城再向西延伸，使玉门关移动到此。《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可以说当时实情与斯坦因在附近长城的调查是一致的。

斯坦因认为首先以T. xiv遗迹为中心，通过94°以西的哈拉淖尔修筑长城，再向西延伸到93°30′的T. iv遗迹。这里出土了一枚敦煌太守丞禹给玉门都尉的木简[2]："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太守丞禹谓玉门都尉毋取事取粟五十石付丞身临予又奴婢多……"由此可知，永光五年（前39）时玉门关已移到那里。永光五年左右再迁的说法先暂且搁置，沙畹的这个新说立即被王国维引用到《流沙坠简》中。王氏不但在序文中赞成此说，还认为《汉书·地理志》中酒泉郡下的玉门县位于酒泉至敦煌的孔道上，所以这才是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遗迹，而汉代玉门县就是今日的玉门县。王氏稍微误解了沙畹的文意，太初以前的玉门关位于酒泉郡玉门县，太初以后的玉门关正如《括地志》所示里程，位于今敦煌西北的T. xiv遗迹，其变迁应在太初四年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西起亭至盐泽之时。王国维、沙畹这东西方两位大家的主张，几乎使关于玉门关位置的新说成为定说了⑤。

沙畹没有考虑太初以前玉门关的位置⑥，斯坦因当然也遵从这一说法，列举出安西、酒泉之间的两个候选地。其中之一为今玉门县北大约15英里的Shih－êrh－tun（十二敦）村庄附近，位于长城线且邻近疏勒河；其二为布隆吉尔和安西之间，左边是Wan－shan－tzŭ（乱山子）的低矮丘陵所夹的疏勒河峡谷地带，认为后者符合关门的位置。这样在李广利第二次征伐大宛之后，长城肯定很快越过敦煌向西方延伸，如果在T. xxii发现天汉三年（前98）的木简，玉门关遗迹T. xiv发现太始元年、太始三年（前96、前94）木简的话，可证明最迟在公元前96年，长城已经到达T. xiv，那么玉门关的位置也就清楚了。

张维华的《汉置边塞考略》完全遵从沙畹、斯坦因的观点，以玉门关西迁为前提考证当时长城线向西方的延伸[3]。方诗铭的《玉门位置辨》虽不知道其整体要旨，但在玉门关西迁在征伐大宛之后的天汉年间（前100—前97）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对这一说法，劳干在《两关遗址考》[4]中指出王国维的误解，认为汉玉门县不是今玉门县，而在赤金峡附近，位于玉门关东面为首的嘉峪关，或者是西面的赤金峡。太初以后作为玉门新关的T. xiv遗址被称为小方盘城，道光《敦煌县志》已明确指出这是玉门关址。城外侧周围一边八丈，厚六尺以上，西面和北面都有长城遗迹，东、南、北三面，每边都残存三十丈的外郭痕迹，与额济纳河沿岸的障塞极为相似，因此必须考虑小方盘城的外郭，这个城原来应有相当规模。这是根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劳氏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⑪。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中可见1944年关于小方盘城的调查笔记⑫。据记载，城壁一边长26.2米，高7.5米，上端一边长24.8米，宽3.8米。西面和北面都有门，西门宽2.5米，高2.7米，北门宽3米，高4米。北门被晒干的砖所覆盖，城壁可见约1厘米厚的版筑痕迹。北门外据疏勒河不到100米，岸边芦草丛生。北门外土丘中的垃圾堆即斯坦因所发现的T. xiv遗迹，当时在发掘地点稍往东有一个长20米、宽2米、深3.5—4厘米的沟，出土了麻绳、木头、毡、麻布、白绢碎片和刻有"百病如灭、常乐毋复"字样的木栉、楔形无字木简，还有四枚带字的木简残片。后述新获的敦煌汉简，是当时夏鼐发现的。

沙畹主张玉门关在公元前1世纪初从敦煌东面移到西面，这个说法得到了王国维及以后诸学者的赞同，其根据仅仅依靠《史记·大宛列传》相关记载而已，但如果这个记载有其他的解读会是怎样呢？即使旧关的位置在敦煌以东，王国维、斯坦因、劳干的说法都不得不在与敦煌之间的相隔距离方面抱有疑问。太初以后视为玉门关遗迹的小方盘城并不是从沙畹、王国维的推定中得出的，因为自古以来就作为玉门关遗迹而人所共知，之后根据中国学者的调查才渐渐明确这是没有错误的。

二

认同沙畹玉门关迁移说并作修正的，首先是英国的翟理斯。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唐末时期地方志《敦煌录》（S. 5448）中可见以下记载"州西有阳关，即故玉门关，因沙州刺史阳明诏追拒命，奔出此关，后人呼为阳关。接鄯善城，险阻，乏水草，不通人行。其关后移州东。"1914年JRAS上发表了其全幅照片和译注[5]。主旨认同沙畹说，公元前103年在李广利第一次征伐大宛班师时，玉门关即使不在敦煌西北的长城线上，也没有必要认为应在敦煌东面的某个地方[13]。

如《敦煌录》所述，若最初的玉门关是后来的阳关，那是因为元鼎二年（前115年）[14]霍去病在军事上胜利而设置酒泉郡的结果，肯定是距此之后不久在国境西端设立的。禁止李广利进入的玉门关，也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第二次远征"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的玉门关。不久在元鼎六年（前111）设置敦煌郡，其北面开始建筑新的长城，但在李广利远征时还未完成，当时的玉门关在敦煌西南约50英里，也就是日后阳关的位置。李广利即使不通过玉门关也可进入敦煌。在结束征伐大宛的公元前100年左右，长城完成的同时，玉门关迁移到北方即斯坦因长城线上的T. xiv，为了和新的玉门关相区别，开始把旧关命名为阳关。因此阳关和玉门关长期并列成为中国边境通往西方公认的出发点。此说法唯一的根据是唐末写本《敦煌录》的记载，关于阳关之名起源的说法很难认同，同样的传说还见于宋代周辉的《清波杂志》卷七，其中阳明变成了阳兴。但为李广利被禁止进入玉门关却到达敦煌这件事，开辟了一条新的解释途径。

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地方志中，关于玉门、阳关的记载共有三种。其一为巴黎国家图书馆的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中公布了全部照片，但这卷只是敦煌县的一部分，没有关于寿昌县属下两关的记载[15]。伯希和将其与P. 2695归为一类，并且在论文中对此进行介绍[6]，虽没有记载两关的情况，但好像包括了寿昌县的一部分。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一文中[7]，巴黎的《沙州图经》残卷记载玉门关"周回一百卌步，高三丈"，关于阳关的记载为"右在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古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17]所以，这无疑是说P. 503418中的记载。第二，沙畹也介绍[16]了伦敦所藏S. 788《沙州地志》残卷，其中西寿昌城条记载"县西廿五里，武德八年置。"[19]玉门关条记载"县北一百六十里。地理志云：汉武帝后元康中置。西域传云：东则接汉，以玉门阳关是也。"

翟理斯认为此处《地理志》不是《汉书》中的，另外"后元"之后脱掉了一个元字。接下来仍强调前说，即在阳关的位置上最早开始设置的是玉门关，明确的年代不清楚，是为了防御元鼎六年（前111）敦煌郡成立时其西南即今南湖绿洲而设置的，再迁移到西北T. xiv遗迹的地方，认同斯坦因的观点并推定其时间在公元前103年以后，最晚至公元前96年。笔者很遗憾不能接受斯坦因的观点[8]，像斯坦因那样将玉门旧关比定为安西、布隆吉尔之间，当时敦煌是由汉人创立的，

如果没有作为关门的意义，那么一开始开创目的相同的两关——玉门、阳关是不合道理的，应说明阳关是由于其他什么目的而存在，这是重点。

前揭向达的论文名称上可见新发现的《寿昌县地镜》，其中有关于玉门关的记载："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西域传》：'东即限于（以）玉门阳关也。'"[22]向达认为玉门关为今敦煌县西北100公里的小方盘城，其距离与《地镜》上的记载一样，遗迹与巴黎所藏《沙州图经》的记载也一致，但是《地镜》上记载是元鼎九年开设，元鼎没有九年，所以应是六年的误写。武帝在经营河西时，元狩二年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又从二郡中分置张掖、敦煌二郡[23]，所以在这一年开设玉门关，使其成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元狩时从酒泉列亭障至玉门[24]，太初三年又在酒泉以北增置诸障塞。这样完成了河西的政治和军事建设，太初三年李广利第二次征伐大宛，最终确保了河西平和。因此沙畹、王国维凭借《史记·大宛传》认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位于敦煌以东的说法，根据《地镜》的记载很难让人信服。

关于此问题，向氏发表了《两关小记》一文，虽很好，但遗憾的是至今没能看到这篇文章[25]。向氏认为阳关也应在寿昌县内，《元和郡县志》记载在县西六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县西十里，《地镜》中看不到其名称。西寿昌城条记载"县西北五里，汉武八年创置"，之后的一句话在伦敦所藏S. 788《沙州地志》残卷中作"武德八年置"。而其距离在县西二十五里，巴黎所藏P. 2691《沙州地志》残卷[26]寿昌条也同样记载"西寿昌城，县西廿五里"，所以《地镜》中的"西北五里"可能是"西廿五里"的误写。因此《地镜》中的西寿昌城指的是不是就是阳关呢？前引巴黎所藏《沙州图经》明确记载了阳关遗迹，为什么《地镜》中只存在西寿昌城的名称，阳关的旧称是消失了吗？对此苦于了解而抱有疑问。

关于向氏对玉门、阳关的整体想法虽还不清楚，似乎认为至少玉门关从开设当初就一直在今小方盘城。但是，其根据只是《寿昌县地镜》的记载，并且元鼎九年还得改为元鼎六年，假如六年是正确的，不过是采用了《汉书·武帝本纪》分置敦煌郡的年代而已。翟理斯介绍的S. 788的《沙州志》残卷也是同样，他把汉武帝"后元康中置"看成是"后元元康中"的误写。即使是这样，关于这一年设置玉门关的事情，没有叙述任何意见。如果是后元年中错误的话，完全采用《汉书·地理志》中分置敦煌郡的年代。总之，无论《寿昌县地镜》还是《沙州地志》，都是唐代地理志，不能无批判地将其作为资料来讨论汉代的事情。

这一点暂且搁置，关于玉门关的位置夏鼐继承了向氏的说法。如前所述，夏氏在1944年于小方盘城发掘了以下木简：

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

谓天？以次？马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

夜？□传？行？从事如律令

年号虽不清楚，酒泉玉门都尉的护众，在玉门候兼任都尉丞的畸，这两个人署名为了让都尉府派遣的使者在途中可以住宿在官方传舍并最终到达目的地，所到之处都要依赖这份文书。这是一种通行证，通过夏氏可知其发现于都尉治所，大概这是文书的草稿。夏氏在《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和其他木简一起作了介绍，详细叙述了对玉门关位置的看法。

这枚木简首先重要的是，揭示了玉门关都尉属于酒泉郡。近年关于河西四郡设置的先后顺序有诸种看法，关于敦煌郡，很少反对《汉书·武帝本纪》所载元鼎六年（前111）从酒泉郡分置的说法。因此上揭酒泉玉门都尉的木简，无疑应在敦煌郡还没设立的元鼎六年之前，是现存最古老的汉简[27]。这样，这枚木简的发现对玉门关的位置来说是

一把关键的钥匙，玉门关在元鼎六年就已位于发现地小方盘城。敦煌在征伐大宛前就处于汉朝势力范围之下，所以当时在东面设置关门是很奇怪的。向达也持有相同意见，曾经在《真理杂志》1 卷第 4 期发表《玉门关阳关杂考》，认为元鼎六年设立敦煌郡的同时，玉门关就已位于其西面。并且，这枚木简表明玉门关是在敦煌郡从酒泉郡分置之前开设的。但敦煌郡的开设与玉门关设置的时间相距并不远，或许是在同一年。

那么夏氏是怎样解释《史记·大宛列传》中敦煌与玉门的关系呢。按照《大宛列传》的记载，第一次征伐大宛班师时“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第二次出敦煌时为六万人，马三万余匹，凯旋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这样可知玉门关是入塞后最西的第一站，玉门关属于敦煌，所以进入玉门关就等于到达了敦煌。若如劳干所说，玉门关在敦煌县治东相距六百五十里的赤金峡，那就完全忽视了与敦煌的关系。在检查人马损失方面，第一次班师和第二次出发时应该也是到达敦煌后进行的，没有理由特意到六百里的内地去检查。还有第二次出发时明确记载是发于敦煌，回来时也应该是到达敦煌。如果这是因为太初三年第二次征伐大宛期间玉门关西迁的话，向氏前引论文中已指出。关于光禄诸亭障和居延塞的建筑，在《史记》、《汉书》中都有着重记载，为何对于如此重要的玉门关迁移却毫无记载，这很难理解。总之，敦煌很早以前就在汉朝版图之中，即使没有建郡归属酒泉郡，为了守护此地而建立关门也是理所应当的，并且应位于敦煌西面——西北的小方盘城，并且在太初二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史记·大宛列传》中“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汉书·李广利传》中“玉门”下面有“关”字。夏氏认为玉门关一开始就应在敦煌西面，《大宛列传》中的玉门为玉门县，而《李广利传》中是否特意添加“关”字，之后又有了新的解释。《大宛列传》中李广利肯定到达了敦煌，请求终止首次征伐大宛的愿望得不到实现，这也许是从西域上奏的情况。武帝禁止其入关，此时李广利已经进入了玉门关，无奈只能筹划再次远征。这样的解释方法与第二次远征凯旋军进入玉门关的记载很好对应，比将玉门关当作玉门县，或是位于敦煌东面的考虑更妥当[28]。但是，夏鼐的主张是以敦煌地方很早被开发、元鼎六年设立敦煌郡为前提的。总之，关于玉门关位置和开设年代，不能不考虑敦煌郡的开设问题。在讨论元鼎六年说的根据之前，首先必须讨论关于敦煌郡开设年代的诸家说法。

三

敦煌郡开设年代在《汉书》中有两种对立说法，分别为《武帝本纪》所载元鼎六年（前 111）从酒泉郡分置与《汉书·地理志》所记武帝后元年（前 88）的。大概自古以来通常都是采用《本纪》的说法[29]。如《资治通鉴》将酒泉郡开设时间从元狩二年（前 121）修正为元鼎二年（前 115），敦煌郡的年代就没有任何疑问了。近年张维华在《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11]中认为敦煌郡在后元年以前就存在，并举出了以下五条证据：（一）《汉书·刘屈氂传》中记载征和二年（前 91）“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二）斯坦因在长城西端附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太始三年“大煎都”字样的汉简，在清楚这是地名的同时，其他地方发现带有太始元年的简中也可见到，可知此时长城已到达今日所知的西端[30]。所以东面据此遥远的敦煌当然肯定已经设置为郡了。（三）《汉书·李广利传》中经常可见敦煌，并且与酒泉、张掖并列记载，所以应该可以看作郡名。（四）《汉书·武帝本纪》太初元年（前 104）条中可见“蝗从东方飞至敦煌”，同书《五行志》、《大宛传》中也有同样记载。（五）《汉书·地理志》敦

煌郡效谷县条，颜师古注“效谷原为鱼泽障”，引用桑钦语（这个本是《汉书》原文，与注混杂）“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效谷在敦煌北面，所以元封六年（前105）时这个地方已经开拓了，可认为在敦煌已经设郡㉛。假如在年代悠久的元封六年就已存在敦煌郡的话，《汉书·武帝本纪》的元鼎六年也应该是对的。

劳干关于敦煌郡的意见与张氏相同，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部中加入了若干补充：（一）《汉书·武帝本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条注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渥洼水根据唐写本敦煌地志无疑是属于沙州寿昌县。《汉书·礼乐志》记载为元狩三年（前120），这时在敦煌已经实行屯戍，虽很难想象，却是这个地方很早就成为汉朝领土的证据。（二）居延汉简中“延寿乃太初三年中，又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俱来田事已”（303、39，513、23）[13]，可见当时这个地方实行了屯田，从语气上可察觉出敦煌已成为郡了。

此处张、劳二氏所举的七个证据，除《汉书·刘屈氂传》明确记载为敦煌郡外，其他还是缺少敦煌为郡的明确证据。即使将其看作县也没有任何问题，作为汉朝领土最西端的县，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需要特别重视。另外如果对《汉书·武帝本纪》四郡开设年代从一开始就怀疑的话，敦煌也没有什么必要拘泥于此了。《汉书·地理志》中武帝后元年的说法，最终是否成立也需要再讨论。施之勉的《河西四郡建置考》对此进行了积极辩护[14]：（一）《史记·大宛传》中太初四年（前101）叙述征伐大宛刚结束后的事情，“……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从敦煌属于酒泉都尉来看，这时敦煌还没有成为郡。（二）《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条中在武帝下达罢轮台屯田的诏书中叙述了征和三年（前90）开陵侯成娩征伐车师㉜，“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三）这个诏书是与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御史共同上奏，针对兴盛屯田提出的，《资治通鉴》认为这一年为征和四年。上奏中记载“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㉝闻”。这里叙述的都是张掖、酒泉的事情，没有涉及西面的敦煌，可知征和四年敦煌仍未设郡，所以《汉书·地理志》翌年即后元年从酒泉分置的记载应是正确的。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的轮台诏中指出了这一点，但其对此如何确信还稍有疑问，乌孙国条中敦煌设置的年代是元鼎六年，所以对张骞时未设郡等说法是没有定见的。

笔者曾经考虑河西四郡建置年代时，从地理位置来看敦煌郡是比较晚的，或许是征伐大宛后的天汉年间的事情。若按照沙畹、王国维的意见，征伐大宛时玉门关就位于敦煌东面的话，在玉门关外的敦煌建郡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若玉门关向西迁移，与征伐大宛后的亭障同时向西方延伸为事实的话，敦煌郡的开设应该也是此时的事情。方诗铭的《玉门位置辩》虽不是很详细了解其内容，大概也是这样的想法。但只有一点是无法解释的，《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元封六年（前105）儿单于即位后的情势，“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夏鼐认为这个记载是证明敦煌郡于元鼎六年开设的重要依据。

笔者在阐述如上意见时，因限于篇幅而有不能充分表达的地方，关于敦煌郡的设立，夏氏的论述包含了新发现汉简的年代和玉门关位置等诸多问题，所以在此从略，留待将来再论。这里再次复述诸家关于敦煌郡设置的观点，既是关联玉门关位置的问题，又是反省自说并争取加以订正的机会。

四

强调夏鼐的新获汉简是以敦煌郡于元鼎

六年开设为前提的，玉门关之后几乎同时开设在西北的小方盘城。这个论据经常被论述，作为与元鼎六年开郡说相矛盾的两个重要问题，夏氏试着作出反驳和说明。

其一，施之勉所举是对《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见征伐大宛后“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这一记载的解释。方诗铭认为这是天汉二、三年（前99、98）的事情，是敦煌还没建郡的证据。但夏氏认为仅说酒泉都尉，酒泉郡都尉当然应在其郡治，而不应该在敦煌。如果是属国都尉或关都尉的话，就应该是张掖居延都尉、酒泉玉门都尉等专名，即使是略称为居延都尉、玉门都尉也是通常的，因此敦煌隶属酒泉都尉没有任何错误。徐广注中“一本无置字，一云置都尉，敦煌有渊泉县，或者酒字当为渊字也”，本来原本中是有异同的，因此意思很难通顺。按照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五，《汉书·地理志》中渊泉县没有都尉，所以把“酒”换成“渊”的说法不成立，徐广注所引“置都尉”是正确的原文。“敦煌酒泉置都尉”的话解释为征伐大宛之后，在这两郡要地设置都尉。

其二，新获汉简所引出的问题。“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的护众名称，最初所举斯坦因在同一地方所发现的汉简中也可见“太始三年闰月辛酉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这枚木简是决定发现地小方盘城作为玉门关遗迹的第一手材料。夏氏指出，斯坦因在同处发现断简中的“四月乙巳玉门候畸移递所”[34]，相当于新获汉简的玉门候畸。夏氏认为开设敦煌郡的元鼎六年（前111）和太始三年（前94）实际相隔17年。护众隔十几年不会再次成为玉门都尉的话，只能认为其在这一时期内任同一职位，同意夏氏之后的意见。《汉书·段会宗传》中“三岁更尽”，其注引如淳所言“边吏三岁一易”，可知按照这个原则，护众五期以上仍在玉门都尉的职位上。当然这也有例外，边疆的守备要求熟练者，《史记·田叔列传》中孟叔十余年间都为云中太守，《后汉书·祭彤传》中祭彤将近三十年为辽东太守，这样的证据是很多的。并且夏氏主张敦煌郡是在太初征伐大宛以前的元鼎六年所创立，其唯一证据如前所述，即《史记·匈奴列传》中“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的记载。《汉书·匈奴传》中没有最后的“郡”字，夏氏是这样解释的：《汉书》中的云中和酒泉无疑都是郡名，所以没有必要特别在敦煌后加上郡字，故特意省略了。《史记》中这条材料相隔敦煌郡开设不久，若不加郡字恐怕会误认为酒泉郡的敦煌县或是敦煌地方，若不是这样，肯定也会考虑此郡与上面云中、酒泉二郡是相关联的。

以上是夏氏观点，但敦煌作为地名明确出现在史书中是在征伐大宛之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元年，第一次征伐大宛军从敦煌出发。“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归还时虽到达敦煌，却被禁止进入玉门关，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第二次征伐时敦煌成为大规模军队的出发基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凯旋军第二年进入玉门，大概第二次征伐时[35]，《汉书·李陵传》记载，“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从敦煌出发，可知当时敦煌位于塞上，归还时经过玉门关，可见敦煌和玉门关同在塞上，不难想象它们都是通往西方的门户。

另外《汉书·西域传》中第二次征伐大宛时，匈奴联合楼兰搅乱汉朝远征军与西汉的联系，为防止这种状况而进行处理：“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36]闻。”也就是任文屯戍玉门关守备远征军后方时，生擒了匈奴兵，所以此

时玉门关肯定在敦煌西面。暂且搁置这一年代，玉门关开设当初就位于今日小方盘城，应认同向、夏两氏的说法。敦煌两次被选为远征军的出发基地，是因为此地便于在后方集结人畜物资。玉门关在北方第一防线附近，正如文字所述是中国最西端的门户，从西方进入玉门关就意味着到达中国[37]。凯旋军应是首先进入这里而受到欢迎。第一次远征军班师敦煌，也许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李广利害怕激怒武帝而留在敦煌不能返回长安，解释为停留在此为来年再出兵做准备，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总之，出敦煌前往西方，不一定非得经过玉门关。《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李陵传》都记载"出敦煌，西为盐水"，另外《大宛列传》记载"敦煌置酒泉都尉，西置盐水，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则记载为"于是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出敦煌后开辟通往罗布泊的道路，征伐大宛后交通发展起来，为保护这条路线而在沿道设置亭。

汉朝势力从酒泉向西扩展也不是很久的事。《史记·大宛列传》对元封元年之事记载为："其明年，击姑师，（赵）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38]这个记载的后半为元封三年之事，在完全控制楼兰的同时，显然汉朝势力从酒泉扩展到了敦煌西方。大概玉门关这时已经存在，位于汉朝领土的最西端。如前所述[15] 566–577，酒泉郡的设立为元鼎六年的话，到元封三、四年敦煌最终归为汉朝行政管辖之下为自然之势。可据此认为敦煌设县或是建筑亭障也在同时进行。如张维华所指，《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条下引用桑钦所言，效谷县是元封六年开设的，顺应这样的情势显示了此地的发展。

斯坦因发现的古长城从酒泉向西延伸，连接敦煌，北面越过党河下游，从哈拉淖尔南岸沿疏勒河到玉门关址。此长城在元封三、四年时就从酒泉延伸到玉门关，之后玉门关成为中国西端的关门，敦煌与此无关系，或者更晚才发达起来，应该是征伐大宛时急遽发展起来的。这样考虑也可以自然地解释夏氏的新获汉简。夏氏认为酒泉玉门都尉十几年任此职，只能以元鼎六年敦煌郡开设为前提。如果将太始三年的木简和新获汉简直接比较的话，两者都存在玉门都尉护众，在此基础上新获汉简自然是太始三年前后的。另外在敦煌发现的汉简中最古老[39]的是天汉三年[40]（前98），看不到元鼎年间的。因此太始三年时玉门关就已属于酒泉郡，敦煌也自然属于酒泉郡。《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见敦煌有酒泉都尉的记载也不是错误的，征伐大宛后立即体现出敦煌的重要性，在敦煌设置了重要的酒泉郡都尉，可以解释为管理与西方的军事和交通。总之，太始三年时还没有敦煌郡，敦煌这个城镇或是作为县而存在，应与敦煌郡的开设分别对待。

以前笔者认为敦煌郡开设于天汉年间，是受到沙畹、王国维两位大家所主张的玉门关在征伐大宛之后从敦煌由东向西迁移之说的影响。敦煌郡的设立年代若在太始以后的话，应该推到多久呢，或者《汉书·地理志》后元年（前88）是正确的吗？《史记》、《汉书》中带有敦煌郡的文字最早出现的确切年代是何时？张维华列举了《汉书·刘屈氂传》中如下记载，是征和二年（前91）的事情："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41]第二年是征和三年开陵侯成娩征伐车师失败，征和四年武帝出诏罢免轮台的屯田，反省常年外征所采取的消极政策。《汉书·地理志》记载第二年即后元年开设敦煌郡，很难认同采取消极政策的武帝在晚年建立新郡。因此敦煌郡的开设应在太始末至征和初年（前93—92）之时。

《史记·匈奴列传》中元封六年后匈奴的

右方为酒泉敦煌郡的记载，如夏鼐所说《汉书》中可见“郡”字。但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很难说。如果以敦煌郡在元封六年以前存在为前提的话，就会得出夏氏的结论，但如果不是的话，就要考虑再讨论了。施之勉举出征和年间没有敦煌郡的证据，即《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征和三年在玉门关迎接从酒泉派出驴橐驼的征伐车师军队，这里没有敦煌的名称，但这并不能成为施氏所说的根据。从酒泉到玉门肯定是当时的正路，不一定非要经过敦煌。

五

那么阳关是什么时候，因什么而建立的呢？阳关的名称在《史记》中几乎看不到，除了《汉书》中的《地理志》、《西域传》、《赵充国传》和《后汉书》中的《西域传》外几乎找不到。《汉书·西域传》记载“东则接汉，限以[22]玉门阳关”，这两关作为汉朝通往西域的关门，在各种情况下通常没有任何区别而并列记载。两者都是独立的关，无论出哪个外面都是西域。《汉书·西域传》记载“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42]无论从玉门关还是阳关出发，都沿罗布泊沿岸，从此分南北两道，南道经鄯善、北道经车师前王庭[43]。同传中只叙述了南道:“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王国维在《流沙坠简考释》中指出，在玉门关址发现了从莎车、车师诸国归还汉朝使者的木简，可知南北两道是从罗布泊北岸的楼兰分开的。但王氏指出《汉书》、《后汉书》中的《西域传》没有列举玉门、阳关作为两道的起点，《魏略》的《西戎传》和《北史》的《西域传》也只是承认玉门关，也就是从阳关出发的道路绝对不会停留若羌再前往鄯善的。《汉书·西域传》记载若羌离阳关很近，没有在西南的僻远孔道上，虽为可见的证据但仍可疑。同传中有很多经过南北二道以阳关为起点表示里程的地方。经过若羌可立即进入南道，所以在三国时代被经常利用，《魏略·西戎传》中清楚记载南道“从玉门关西出若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44]。但是汉代南道通常是经由楼兰的，《魏略》中玉门关如后所述，当时的阳关可能已被废止。

今日阳关遗迹清楚地比定为敦煌西南约70公里的南湖店西南3、4公里的古董滩附近，将南湖店的古城认为是汉龙勒县、唐寿昌县的遗迹和阳关城都是错误的[45]。这个位置关系与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唐代地志记载一致，没有丝毫疑问。今从古董滩越过红山口西北大约60公里，连通前往小方盘城的大道。因此敦煌、玉门关、阳关三地的位置关系大概就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今从敦煌到小方盘城不经过南湖的话，要越过党河到达西北的哈拉淖尔，再经过大方盘城，必须经过100公里的路程。

这且搁置不说，为什么在相距数十公里的两个位置上设置职责同样的两关呢？这仍然是个问题。斯坦因将玉门关当作北道、阳关当作南道的出发点，是寻求其地理上的特殊性，但绝不是当初作为区别的原因。如前所叙，玉门关作为通往北方长城线的终点，在敦煌发展之前就已成为关门，是通往西域的正道。并且在征伐大宛时，为集结大军而将后方的敦煌作为出发基地。《汉书·李广利传》记载第二次远征军从敦煌向西，分南北道进军，这应该是指到达罗布泊，从那里分为南北两路。征伐大宛之后，汉朝和西域之间的交通立刻频繁起来，阳关是否开辟了从敦煌直接通往罗布泊北岸的交通路线？阳关的开设时期，大概是在敦煌设郡成为西域交通中心前后的事情。但是从阳关通过玉门关后立刻到达罗布泊的话，该采取怎样的路线呢？如果向正西前进，不远就是库姆塔格沙

漠，很难想象选择这条艰难的路线。虽不能说是正确的，在西北最终与玉门关的道路相接合到达楼兰。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认为，无论是出玉门关还是阳关，都要通过同样的线路到达库穆胡图克附近再分为南北两道[16]41－42。从此北道经过楼兰，南道经过鄯善，但仍然没有说明玉门关、阳关并设的理由。

玉门关的名称含义通常被认为是从于阗运送玉料的门户，对此在南面开设带有阳字的关，当然是出于阴阳学说。即使没有必要设置两关，开辟阴阳二关也许是为了祈求汉朝在西方的发展。这暂且搁置，在作为敦煌前进基地的阳关附近设置龙勒县，阳关、玉门关皆属于这个县，这是敦煌作为西域交通中心逐渐发展的结果。《汉书·地理志》敦煌龙勒县条记载“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可见二关归属敦煌郡统治下的状态。阳关与玉门关相比距离敦煌更近，在地理和政治上的优越性似乎使其成为南北道的起点，《汉书·西域传》中可见通往西域诸国的里程都明确以阳关为起点。除鄯善外，若羌和乌秅等南道诸国至北道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的距离、大月氏五翕侯和康居五小王居城的距离，都以阳关作为起点。不用说，玉门关位于北方长城线的西端，即接近对抗匈奴的第一线，通过汉简可知玉门侯官、玉门侯、玉门关的所在地，皆由玉门都尉驻守并统率。与此相对，阳关位于安全的内地，掌控着肥沃的南湖绿洲，邻接龙勒县治，在交通和贸易上与玉门相比，始终处于有利位置。

到了东汉，作为通往西域门户的记载都是玉门关，阳关的记载越来越少。《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帝时西域诸国叛离之际，人人都献言封锁玉门、阳关，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关于阳关的重大记事。同传即使在叙述南道诸国时也只是记载为“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没有列举阳关。从敦煌出阳关沿着罗布泊北岸的道路，到东汉应该不再使用了。其中有各种原因，可能是西汉末期为避开两关之外的沙漠，从玉门关到高昌方面开辟了新道路，或是从阳关到罗布泊的通路受到了羌族的威胁等等。在此基础上，罗布泊地域的干燥化也有可能带来严重影响。在《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龙勒县条中，只能看到玉门关。因此东汉末期的阳关可能被废止了，从敦煌到龙勒经过阳关到玉门关的道路也许早就成为通往西域的孔道了吧。阳关作为从敦煌到西域的关门所代表的重要意义，也许在西汉征伐大宛后短期之内就发生了特殊情况。所以此后几乎没有利用阳关的记载。在《晋书·地理志》中，和敦煌郡龙勒县一并记载的还有阳关县，这肯定是在汉阳关之后设置的。《元和郡县志》中也记载了北魏在此设置阳关县，后周时废止，除此之外详细的状况就不清楚了。

到了唐代情势就不同了，从《新唐书·地理志》所引贾耽的《道里记》可见西域南道通过阳关故址前往罗布泊南岸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最初所举敦煌所发现的唐代地志，唐初在此设立西寿昌城也显示了当时此地的重要性。《元和郡县志》中玉门关为北道、阳关为南道起点的记载，也以唐代的情势判断。

简要总结以上论述，可得结论如下：敦煌地方在元鼎末年（前111）设置酒泉郡后，元封年间实行开发，为保障这一行动而从酒泉到玉门修建了长城。这是元封三、四年（前108、107）时的事情，大概玉门关也在此时创立，当时位于汉朝领土最西端即今日的小方盘城。敦煌的设立时期暂且搁置，其位置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变化，应遵从向达、夏鼐的意见。敦煌郡的开设时期虽在征伐大宛之后，但笔者修改自己的前说即天汉年间（前100—前97），认为应稍稍后推为太始、征和交际之时（前93、92）。阳关是敦煌郡成立前后开创的，所以成为敦煌直接通往罗布泊沿岸楼兰的关门。敦煌和盐水之间“往往设亭”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这条道路，表示

这时汉朝的前线从玉门往西移动到了罗布泊。这样敦煌作为汉朝经营西域的基地而逐渐发展，与玉门关相比占有优势的阳关成为西域交通的主要起点。然而这只是西汉时期的特殊现象，到东汉关于阳关的记载变少，至末期应该是被废止了。

本文原载《东方学报》（京都）第27册，1957年3月，第31～58页。

注释:

①《史记·大宛列传》，原文“不足拔宛”补为“不足以拔宛”，第3175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大宛列传》没有明确记载年代，兹从《资治通鉴》。

③《史记·大宛列传》原文“自”字删去，“列亭障”改为“列亭鄣”，第3172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 沙畹第305号T. xiv. iii. 15。《流沙坠简》簿书类十二。

⑤沙畹第428号T. iv. d. 2（recte T. v. 2）。《流沙坠简》廪给类二十四，最后的“多”字据贺昌群校正加上。夏鼐在《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民国三十七年出版）中所指出，永光五年简的出土应是Serindia（vol. II. P. 641）在T. v整理时误写的。他认为T. v是东经93°19′附近的露台，既没有古城也不沿着大路，所以不可能设关。另外，原简中“玉门”残缺漫漶，“都尉”二字是沙畹臆测添加，王国维认为保留这个是正确的。根据Serindia原文，T. v与T. iv相比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是个露台而已。此外，木简是根据贺昌群所示解读的。

⑤《史记·大宛列传》“正义”所引《括地志》“玉门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县指唐寿昌县，即汉龙勒县，在今敦煌西约70公里处。

⑥例如松田寿男《汉魏六朝の西域》（《世界文化史大系》，第6卷，《汉魏六朝时代》所收），昭和十一年出版。

⑦关于其位置，沙畹没有论述，或者可能像布莱特·施奈德（Mediaeval Researches，ii. P. 215）一样，大概比定为今玉门县。

⑧Serindia，vol. II，p. 726。“天汉三年简”是沙畹271号T. xxii. c. 22，《流沙坠简》廪给类六。“太始元年简”是沙畹号304. T. xiv. iii. 67，《流沙坠简》杂事类五。

⑨Serindia，vol. II，pp. 726－728。斯坦因注意到这枚太始元年的木简上有“煎都亭”字样，现在看到的是长城西端T. iv. b中发现的太始三年简（沙畹450号，《流沙坠简》簿书类二十四），其中有“大煎都丞”字样，那里应该有大煎都侯官遗迹，至少公元前96年已经到达长城西端。假如这是事实的话，将在T. iv. b发现的简解读为“太始”是沙畹的误读，应按照王国维读为元始。

⑩载《西北通讯》创刊号，因没见到本文，所以主旨不清楚，这一点是从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民国三十七年出版）中得知的。

⑪劳干这年参加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出版）所收向达《西征小记》就是其报告。

⑫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1944年，以向达为首，夏鼐、阎文儒等为骨干，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共同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对河西地区进行调查，这是从10月到11月的部分报告。此次考古记录的一部分发表在《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为阎文儒《河西考古简报》（上）。

⑬实际上翟理斯认为玉门旧关在敦煌东面的话，与《汉书·地理志》所载阳关、玉门关同属龙勒的记载相矛盾，故对此进行调和。但《汉书·地理志》是记录西汉末的情况，所以这里没有必要考虑。翟理斯认为玉门关后来迁移到沙州东面是东汉以后的事情，这会是怎样呢？劳干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本的文章可见唐朝以后的情况。

⑭这个年代，按照沙畹的意见采用《资治通鉴》中的记载。

⑮唐代沙州敦煌郡所属的寿昌县是汉龙勒县，所以玉门、阳关这两关归此县管辖。

⑯L. Giles “A ToPographical Fragments from Tun huang”. Bulletin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London Institution，vol. VII. part 3，1934. pp. 552－554. 据森鹿三（后记论文）可知羽田亨曾在《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小川博士还历纪念史学地理学论丛》所收，昭和五年出版）一文中对此作了介绍，好像接在 S. 936 前面。后者仍通过沙畹，在 Bull. SOS，vol. VI，part 4，1932 中刊登了整体照片并进行解说。岑仲勉在其书中将其称为《张大庆抄地志》，参劳干《两关遗址考》。

⑰“□□在玉门关□，因号阳关”改为“西通古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30 页。

⑱原文为 P. 2695，经核对，应为误。

⑲西寿昌城如后记，在唐代位于原来阳关的位置，森鹿三（后记论文）推定为武德八年之事。

⑳此条标点录文参照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第 218 页 2008 年。

㉑对于这一问题，森鹿三《新出敦煌石室遗书、特に寿昌县地镜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10 卷 2 号，昭和二十三年出版）论述较详。《图书季刊》原题虽为“地境”，但“地镜”肯定是正确的。

㉒此条标点录文参照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西域传》“即限以玉门阳关也”改为“东即限于 [以] 玉门阳关也”。

㉓此年代完全遵从《汉书·武帝本纪》。

㉔如前记，此为元封三年的误写。

㉕向达《西征小记》（《国学季刊》第 7 卷 1 号）《瓜沙谈往》中的一篇。

㉖伯希和、羽田亨《敦煌遗书》活字本第 1 集所收。

㉗此简最为古老，如王明《简与帛》（《考古通讯》1955 年第 2 期）中所见，在一部分上是承认的。

㉘此说法在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 70 期《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中，第 71 期向达写跋赞同了这个意见。

㉙关于河西地方属于汉朝领土的年代，参日比野丈夫《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いて》，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廿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昭和二十九年出版。

㉚张维华根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叙述了这个错误。

㉛向达在《玉门阳关杂考》中指出这点，《史记·大宛传》中元封三、四年时从酒泉列亭障到玉门，鱼泽障为其中之一，所以玉门关的西面就是敦煌的西北。敦煌本《沙州都督图经》（载《鸣沙石室佚书》）中有鱼泽都尉，罗振玉在跋中认为这是正确的，补充了《汉书·地理志》和颜师古注的夺文，很难认同这种想法。

㉜《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条作“征和四年”，《武帝本纪》及其他修改为“三年”，徐松已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指出。

㉝原文为“目”，改为“以”，《汉书·西域传》，第 3912 页。

㉞沙畹 315 号 T. xiv. iii. 14，没有照片，《流沙坠简》没有引用。

㉟这个记事，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认为是太初二年的之事，但此时武帝反对暂时停止对大宛的征伐，所以李陵接到武帝命令迎接李广利。这应是叙述第二次征伐凯旋之时的情况。

㊱原文为“目”，改为“以”，《汉书·西域传》，第 3877 页。

㊲《后汉书·班超传》中可见班超上疏“臣幸得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恐后代谓臣没西域，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表现。

㊳其中“七百先至”改为“七百余先至”，“障”改为“鄣”，《史记·大宛列传》，第 3171～3172 页。

㊴该文发表年代较早，随着汉简的陆续发现，“天汉三年”已不是发现最早的汉简。参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年。

㊵沙畹 271 号 T. xxii. c. 22。《流沙坠简》廪给类六。

㊶原文为“目”，改为“以”，《汉书·西域传》，第 3871 页。

㊷《后汉书》作“三百余里”，但《水经注》等认为是“千三百余里”的误写，应遵从王念孙的说法(《读书杂志》汉书十五)。

㊸楼兰和鄯善的位置，按照沙畹的看法，前者位于今日罗布泊北岸的楼兰遗址，后者位于南岸的米兰遗址附近。

㊹《三国志·魏书》卷30裴松之注所引。

㊺向达《西征小记》(载《国学季刊》第7卷1号)，认为阳关遗迹在古董滩和其北500米红山口之间。但是劳干《两关遗址考》认为遗迹在古董滩，为同地大约200米的四方古城。

参考文献:

[1] E.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Introduction pp. vi–vii.

[2]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London, 1912, P. 137.

[3] 张维华. 汉置边塞考略 [J]. 齐鲁学报, 1941 (1).

[4] 劳干. 两关遗址考 [J].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1944.

[5] L. Giles, "Tun Huang Lu, 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RAS, 1914, pp. 715–718.

[6]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 'ou King" et la Colonée Sogdienne de la Région du Lob Nor, JA, 1916.

[7] 向达. 记敦煌石窟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 [J]. 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 1944.

[8] Serindia, vol. II. pp. 623–624.

[9] 夏鼐. 新获之敦煌汉简 [J].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1948.

[10] 张维华.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第2卷) [J].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1962.

[11] 劳干. 居延汉简考释 [J]. 民国三十三年四川石印本.

[12] 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 [M]. 活字本(3).

[13] 施之勉. 河西四郡建置考(第3卷) [J]. 大陆杂志, 1951 (5).

[14] 日比野丈夫. 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いて.

[15] Serindia, vol. II.

[16] 黄文弼. 罗布淖尔考古记 [M]. 1948.

Management for the Western in Han Dynasty and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Two Passes

[Japan] Written by Hibino, Translated by Wang Le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discuss the installing time and location of Yu Men pass and Yang Guan pass in Han dynasty. Wi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evious study results and the use of Han Jian unearthed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s, it is believed that Yu Men pass was set up during Yuanding (B. C.) and Yuanfeng (B. C. 108/107). The location of the Yu Men Pas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has been no change. By amending the prior statements,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Dunhuang prefecture should be during Taishi and Zhenghe (B. C. 93/92), while Yang Guan pass was set up around the time of Duanh uang prefecture. Compared with Yu Men Pass, Yang Guan pass as the base for managing the Western Region developed graduall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became the main beginning point for the Western Region communications for a time, abandoned till the end of Han Dynasty.

Keywords: Yu Men Pass; Yang Guan Pass; Dunhuang Prefecture; Han Jian; Dunhuang Documents

(责任编辑　保宏彪)